

作家与作品

# 循环历史与宿命人生

——读郭文斌、韩银梅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夏》

季红真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在纯粹史学的领域大可质疑。但是在文学的领域几乎是一个铁律，作家们只是寄根于历史的母体，开辟出超越时空的思想飞地，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的独到见解。但是基本的时间顺序则是真实性的坐标，剩下的只是阐释的角度与方法的问题。郭文斌和韩银梅的长篇历史小说《西夏》，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西夏国由创立到消亡的时间框架中，以十代帝王的生死荣枯为线索，打捞出了党项民族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填补了历史时间的漏洞，在这块历史叙事的处女地上播种和平的种子。这也是水下的考古，通往发现的惊喜中有过多少令人窒息的摸索？剪裁复原花费了多少心血？叙事中包含了多少情感的损耗？这里有对生养之地悲凉审视中的自我确立，简洁的文字中流淌着融解在血液中的乡土情感；心理逻辑的推演中有对残酷权力争斗与血腥征伐的价值疑问，悲悼了无数在错动的历史戏剧中无辜毁灭的生命；有对帝王政治的犀利解剖，在一个民族强盛的光荣与梦想中，概括了所有王朝盛极而衰的循环规律。叙事起承转合的缝隙中，凸显了人欲膨胀的灾难、偶然进入这个怪圈的喋血人生，因此超越了一个民族一时一地的具体内容，转喻了人类大历

史的人性根源。欲望的潜流是政治转台幕起幕落、文化器物装点的地表之下汹涌的岩浆，每一次突发的喷涌与跌落沉寂，都是热力积蓄翻滚与消耗的悲壮诗篇。这是历史的终极宿命，也是人生的终极宿命。作者似乎在探寻人性的限度，民众生存的视角中是俯瞰着被历史顷刻埋没的生命无限悲悯的目光，激荡着超越历史的苍凉诗性。而最终的祭奠带来的清明祥和，则是所有喷发冷却之后宗教精神的升华。全部叙事终止在神话的虚构形式中，完成了对人类漫长历史苦难的超度。

—

《西夏》是一部党项民族的交响史诗。

它的序曲绵长而曲折，在叙事的间隙中，作者借助人物之口断断续续地交代。作为拓跋氏族的一支，在与中原王朝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因不堪吐蕃的侵扰，自青藏高原而下，迁徙到甘陕一带，与汉民族杂居融合，逐步完成从游牧到农耕的文化转型。他们历代都受册封，平西公、夏国公到西夏王，逐渐割据一方。赵匡胤削弱藩镇军力和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他们备感受制于人的压抑，宋辽对抗的历史震动，又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历史前台

的裂隙,加上杰出人物李元昊应运而生,崛起便是顺理成章的必然。西夏一度与宋、辽三足鼎立,延续一百九十九年。最后的覆没不出所有王朝衰落的规律,争权夺利的内耗、贵族的腐败和民生的凋敝。终于由西缘蒙古立汗之后的强劲风沙,埋葬了这个溃烂的社会。《西夏》将一个王朝的历史浓缩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通古今之变”的思维触角,扫描的是不断重复的兴亡规律。而其中的雄健、悲壮、苍凉、无奈挣扎的疲惫,直至最后英勇的一击,古老血缘的潜流涌出泉眼,波光映照出祖先灿烂绽放的历史瞬间,是无比复杂而又淡定的伤逝中艺术的叹息,也是所有被血腥杀伐淹没的民族共同的叹息。

小说共计三十一章,开国皇帝李元昊占据了十八章,可见是以兴为叙事的重心。在祖父李继迁垂死前的苦苦期待中,他承袭着独立大业的前定,迟迟来到世间。这个承前启后的时刻,是党项历史的关节,也是人生的起点。“白龙”投胎的传说,和祖父生而有齿的异秉一样,都锁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是一个民族自我巩固的神话。党项人以拓跋氏为祖、黄帝之后的正统血脉,北魏拓跋王朝帝胄之后,也是独立称霸、与宋、辽分庭抗礼的伦理依据与精神支撑,使所有的征伐具有了逻辑的合理性。于是,历史漫长的血腥册页中,翻开了新的一页。李元昊以赫赫战功袭西夏公位,以祖父、父亲两代人西征掠夺、对宋韬晦称臣积蓄起来的力量,开始了一个民族自我确立的残酷开拓。为了这个目的,他用尽权谋、征战掠夺,牺牲爱情接受辽国的政治联姻,将谋反的母族悉数沉河,杀尽政见不合的父族父党……尽管这在去母系社会不远的拓跋氏历史中司空见惯,远逊于他们光荣祖先北魏王朝“子立母死”的残酷定制,还是生动地呈现了家天下的父系社会确立之初,人伦惨剧的基本形式。安提戈涅式的悲剧,不仅规定着女性的命运,一如西夏后期的王妃、辽

国公主耶律南仙,身为辽国国君的父亲被丈夫夏王为国家安全交给蒙古人,李元昊也必须在权力和亲情之间艰难选择。前定的使命使他连抑郁而死的可能都没有,“为了大局,为了江山社稷,个人的生活和情感都算不了什么”。而在堂皇的语词之下,奔腾的是各种无法控制的原欲本能,他在和野利氏热恋之后,又鬼使神差地使初恋的情人表妹小鱼受孕,直至后者从出家到自舍。他不无忏悔地感叹“命运弄人”,“看不见的力量”指使着人的作为,导致亲情之间“意想不到的”杀伐。这力量除了政治博弈的铁血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民族血液中不可驯化的野性本能,他在小鱼怨毒的表情里,“看见了我们党项人骨子里占有欲是多么了得”。一个民族的历史宿命浓缩在一代君主的生死大限中,是更具有自我毁灭的宿命本源。尽管他拓疆土、筑宫室,广纳汉族知识分子,创立国家的政治军事管理机构,奠定了王朝的封建国体;尽管他开河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尽管他革除汉装、简化中原礼乐、下秃头令、创立西夏文字,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确立筚路蓝缕,文治武功没有挽救他被弑的宿命,重复了他的一位光荣先祖命运的结局。以后的九代西夏国君,多数也不同程度地重复着这样的宿命,不是在征战中被杀,就是在宫廷政变中被政治去势,末代皇帝李睨死于新一轮历史循环中崛起的蒙古人刀下。唯一一个逃逸出这宿命怪圈的,是开辟了太平盛世的仁孝皇帝,尊儒、敬佛、办教育,实行和平外交,终于把西夏带进封建制度,使生民得以喘息,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国家延续了长时期富足安定的繁荣。

《西夏》把一个民族的宿命,集中在一代帝王的宿命中,类似原型的叙事运用了元小说的叙事技巧。第一章《金色的夜晚》,以西夏立国十年大庆的宫廷之夜为时空体的形式,将李元昊的宿命以各种手法叙述出来,也暗示了读者他的结局。李元昊闪回的意识流

动中,首先映现出来的,是他与没藏氏在床上渡过一生“最为销魂的时刻”,被重生的感觉中夹杂着男人的失败感,“战无不胜的”他陷落在一个夫死出家的女人手里。野没氏是李元昊与命运生死契约上的密码,是福音也是在劫难逃的符咒,姓氏的宿命不断给她增加新的身份——被杀的开国战神野利乞遇的遗孀、李元昊的宠妃、国相没藏讹庞的妹妹、又是威胁太子地位的小皇子谅诈之母,由此形成李元昊由盛到衰的转折隐喻。在此后的篇章中,李家父子殁命、大权旁落,没藏氏族掌控皇权,都以这个“销魂的时刻”为序曲,是缩短了西夏历史序曲。在这个时刻,他也败在了曾经的爱将、死去的政敌野利乞遇的手里——他的遗孀居然是处女,在“佩服、感谢”之中是道义的挫败感,“骄傲的天都王,最后用一个女人把他打败了”。连带出了野利氏与没移氏,两个女人都和他的家国兴衰密切相关,并且交代了后者在离宫的处境。意识之外的这个夜晚,太子弑父的决心已定,作者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做了交代。两个夜晚叠加在一起,前因后果脉络清晰,宿命的人生形式便以偶然的方式,微缩成历史循环的基本模型。叙事的所有动机都在以后的章节中逐渐展开,只有一个没有时间演进了。这就是李元昊已经觉悟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作为是没有作为的作为”,却来不及跳出权力争夺的恶性循环,终于被儿子兼情敌、政敌宁令哥削去了鼻子不治而亡。历史人生的诡谲宿命,压缩在权力与性的刻度上。而真正超脱于这循环方式的,是李元昊彻骨想念、出走的长子宁明,他好像在高空俯瞰着他“千疮百孔的心事”,启发了他的觉悟。这是全书最基本的主题,在最后一章中借助神话形象的阐释,充分地表达出来。统领全篇的第一章,也像一个玻璃试管,将所有帝王人生宿命的因缘果报浓缩在寻常的政治时空体中,分解为基本的人性元素,透视出历

史循环中隐秘的原始动力。这是政治史山脉之下的暗流,是历史更隐秘的疆域。

## 二

这样的原始动力几乎规定着所有人的历史出场,又最终消失在历史循环的无情法则中。科场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张元,为了实现“货于帝王家”的人生抱负,几经周折到达西夏王领地,这个自命不凡的“侠士”、“英雄”,以狂野放诞的方式引起注意,受到求贤若渴的李元昊的赏识信任,由中书令而国相,推动了西夏立国的大业。最终君臣的离心离德,在对宋战与和的表面分歧之下,是性与文化。他厌倦了西北的单调风景,思乡的情感日浓,应该还有潜意识中封建士人“衣锦还乡”人生理想的幻灭,只有苟且在与李元昊的小妾、精通音律的索氏的爱情中排遣惆怅。而他所沉溺的音乐,又是李元昊去汉化的文化政策所极端排斥的,“自古以来先王们制作乐器礼仪都是为了管理百姓,而我党项人的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唐宋的繁音缛节根本不适合我夏国国情,必须改造”。张元终于还是政治失意,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

《西夏》的历史叙事策略,基本就是建立在这样由宿命制约的欲望关系中。这里面包含着个人进入历史的偶然途径,与历史连接的特殊方式,在无数的偶然中,凸显出在历史的利比多场域中,谁也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共同处境,厘清了个人与历史的基本关系。作者在不断转换的叙事人称中,从张元开始,让所有主要的人物以在场的方式自述,独立成章、顺序出场,将历史的碎屑扩展为人生的独特故事,也由此展现出比政治版图更广大更永久的心灵疆域。谋反的卫募山喜由于李元昊接受辽国联姻,他的国丈梦被击碎,看透“亲情在王族中是最微不足道的”,终于引来杀身灭族之祸。就连忠勇的开国战神野利乞

遇,陷落在政治的阴谋中,出逃不成反而被宋朝边将射杀。在他反对李元昊攻宋的政见中,也有对宋地外室的情感挂念,民族国家的大义纠缠着私情,求生的本能无法突出政治绞杀的重围。送谤书的信使“强烈地想用我们年轻的鲜血去换取功名”,爱情是他功名心的驱动力,终于在坐骑被教练射杀的分秒之间,完成了类似于巴威尔“第一只鹅”式的成人礼仪式,“练习掉柔弱”,他得以死里逃生完全是偶然的际遇,但功名与爱情都被搁置了起来。作为战俘的索氏被打入冷宫,试图以巫术谋杀李元昊的动机,是因怀孕即将暴露与张元的私情,为了求生而陷入弑君的“罪恶”泥潭,只能以自舍殉情彻底逃避幽闭的命运。宋军奸细王崧在贫贱中感动于边将的知遇之恩,万死不辞地牵引着离间计的细小线头,扮演了历史戏剧开场一幕的关键角色,他的结局被省略,更多的叙事功能是解密。一直到以未亡人的身份登上皇后宝座的没藏氏、开始三十年后党专权的梁氏、身兼辽国公主与夏国皇妃两种身份的耶律南仙,到一身系着两个王朝交替的末代公主李嵬名,她们的自述中都是以欲望为中心,偶然成为历史戏剧的角色。或者是求生之后的纵欲,或者是家族权力的角逐,或者是种族国家之间的仇杀,都在父权制政治的游戏规则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悲剧的人生结局。这种结构的叙事策略,以简约的重复,删繁就简地处理史料,省略了解读历史密码的繁难过程,转化为人物富于装饰性的生命图式。

在所有的自述中,宋将狄青、宋使曲珍和大乘玄密帝师自述,另有独特的叙事功能。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或者见证了某一个历史事件,或者见证着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他们都超脱于西夏人的种族身份,可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一段复杂的历史,开辟出历史叙事的他者维度。这样多维的视角,才可能使偶然进入西夏政治史的重要人物,呈现

出悲剧的相同图式,装饰出西夏历史斑斓的纹路。每个人物又都担当着不同的叙事和表义的功能,是主题不同侧面的展示。宋将狄青的自述最复杂,身处“重文轻武”的时代,国家在危难中,英雄报国的火热豪情被熄灭在文官制度的监视与制约中,惊恐不安地壮年而亡。他所承担的叙事功能,首先是被放逐的个人命运反映了宋代朝政的痼疾,其次则是以他的记忆,引出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场的历史情境。宋夏两国都是主战的强硬派得势,战争的盲目屠杀势在必然。范仲淹主张以防为攻,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关于将军的生死观体现着民本的战争伦理观,“作为一个将军,更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将军的生死系着战士的生死,而每一个战士的身后都是一个家”。他在政治棋局中任人摆布的孤独滋味,理解了范仲淹《孤雁儿》的词句“只是人千里”,“人”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所有渴望回家的人灵魂和故乡的距离,以及“一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他的宿命是权力博弈中敌对双方忠勇之士的共同宿命。“大家都在这行李中了。这一刻,我们到底谁是赢家呢?”但理性的力量永远是微弱的,范仲淹无力阻止无辜生命间的疯狂杀戮。而李元昊看见的则是战争的非理性:“……战争一旦打起来那就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不会是说停就停得了的。”这是另一重宿命,人类集体疯狂的自相残杀,是历史循环中首尾相接之处最通常的酷烈景观。一如宋使曲珍的惨痛记忆,永乐城大战中三十万宋军遭屠城覆没。他身负朝廷使命,出使西夏参加发动这场战争的梁太后葬礼,特殊的地位与记忆的闪回,为西夏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一部后党和皇党争权的历史,就是不断对大宋发动战争的历史,而这罪不容赦的战争,大多时候就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大乘玄密帝师的见闻,则是对西夏明君仁宗开辟的太平盛

世的记忆,这也是整个党项民族对历史巅峰时期的记忆。他的自述终止在西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仍然是欲望的泛滥带来遍及朝野的腐败。耶律南仙的自述,记录了辽国灭亡的最后时刻,疲弱的西夏已处强弩之末的苟安地位。西夏公主李嵬名自述的经历,在对成吉思汗死因的揣度中,喷发出西夏民族面对亡国劫难的血性抗争,其悲壮超过西夏所有的征伐,也超过历史上所有的征服性战争。而且是以一个娇柔女子,承当了这悲壮的喷发。这也是历史循环首尾相接之处的常见传奇,女英雄总是在历史的断裂时刻涌现。

### 三

在泯灭人性的权力角逐与民族之间残酷的征战中,前定的宿命使李元昊在通往至高权力的道路上备感孤独,内心凄凉而犹疑。就是别无选择地接受前定,心硬如铁地投入宫廷与战场上的厮杀,个中滋味以血肉之躯也是难以承受的,除了对前定目标的执著信念,只有女人的身体与宗教是他精神逃避的安全空间。

《西夏》中几个与历史有关的女性,在共同的悲剧宿命还有共同美貌的身体。这是她们人生际遇中相同的生命图谱,是她们进入历史的基本方式,也是她们装饰历史纹路的基本样式,代表着政治女性的共同宿命。作者强调了她们进入西夏历史更加偶然,政治联姻、英雄崇拜的好奇、沦为战俘、以稀薄的血缘关系入宫求生、战败求和的礼物……自述的方式中,展示了她们可能有的心理活动,历史叙事也因此而又多出性别一维。宏大帝王系谱的字里行间,散落着她们的情感碎片,还有她们被所有元叙事掩埋的血泪。这些女人起初都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的欲望,她们像是李元昊的另一个家园,使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获得重生,爆发出力量激情的同时,

也陷落在每个女性血缘身体维系的其他同性手中。亲情与国法的“最难选择”一再重复,但在母亲自舍的一刻,李元昊已经完成了政治的成人礼。可是练习掉了柔弱,并没有解除心灵的苦难。长时间重复的梦境中,呈现出无意识中的返宫情结,“他变成一个很小的龙胎,藏在一个温润安逸的地方”。但宿命在胎中就已经前定,他走的是不归之路,于是,所有女人的身体,都引诱着他重温梦境。

面对怨毒、恐惧、阿谀逢迎的巨大压力,他身心具疲、病痾缠身,是野利氏的悉心照料和温婉言语的安慰,使他恢复了健康与自信。女人的救赎力量近于宗教的功能,帮助他渡过最初的身心危机,不仅是母性,简直是“菩萨”,宗教无疑是李元昊获得精神解脱与政治理想自我巩固的另一种灵丹妙药。《西夏》的作者,显然对于宗教的价值深有洞悉,但是对它功能的阐释则暗含反讽之意。野利仁荣释解李元昊的孤独与绝望,是借佛学的姻缘之说“万法因缘生”。“以心为国,以法为土”的教导,无疑拓展了他心灵的国界,“出世间法的大智慧”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破解的方式则诠释着他杀戮的合理性,“随缘”的另一重意义是弃绝情感,“不受制于因果”的原因是,“炕上坐的莫非怨家债主,锅里煮的无非六亲眷属”,这自然也有鼓励担当的意义。这是一次精神的成人礼,使他心意平衡地稳坐权力的顶峰,也使党项民族顺利登上历史的峰巅。对于帝王的心理分析,和历史循环与人生宿命的主题一样,是《西夏》最富现代意识的精彩笔墨。而仁宗的改革中有着弘佛的内容,僧侣阶层的特权地位在盛世的华章中尤其显赫,佛又是所有人解释宿命与承担苦难的心灵依据,渗透在全部作品的叙事过程中。这除了佛教在西夏影响的历史真实之外,也为叙事者审视历史提供了思维的模式,在“缘”的观照下,大夏国只是汪洋历史水域中的一粟,所有彼此

争斗的血缘家族都是“粟中缘”。“生、成、住、坏”的姻缘果报,更是循环历史中人欲灾难最基本的发展曲线。从而超越了所有的历史纷争,这也是《西夏》的历史叙事超越其他历史小说的地方。作者也以这样的方式,升华了自身的乡土情感。

在所有的自述中,妙音鸟的自述别具一格,拟真实的历史叙事终止在神话的虚构结局。叙事的功能在于化解所有历史的疑点,历史归根结底是不可以尽知的。而虚构的自述者又是这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艺术化身,她人首鸟身,是五方佛前的乐舞供养,有着娱乐神的使者身份,历千年轮回而在火中再生。在完成了八百年侍奉五方佛的使命之后,最后二百年生命沉溺于可怕的梦境,邂逅了西夏国,目睹了无尽的悲壮惨烈,并且与之同亡。西夏亡国的大悲时分,就是她向死而生的极乐时刻,这无疑叙事动机最初形成的偶然契机,遭遇西夏的历史是创作灵感爆发的缘由。历史难以求证的悬疑空缺,由此在虚构中被想象的汁液灌注弥合,断简残篇也缝缀出完整的画卷。这个法名迦陵频伽的妙音鸟,出现在各地的佛教遗存中,只有在党项人的故土,有充当脊兽和高居皇家陵墓门阙的权力,可见是他们的守护神。她以狂喜迎接死亡,在烈焰中重生。她守护的西夏国,也必将会和她一起在毁灭中重生。当然不是一

个王朝的重生,而是种族的重生,鲜卑——拓跋——党项人的重生,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重生和全人类的重生,乡土的情感最终转化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这只为“终期付出最后的精力”的神灵之鸟,“不能救世”、“只能旁观”,也是作者叙事立场的宣示,书写尽历史循环的残酷与人生宿命的苦难,又是“终极乐观者”。这使《西夏》的历史叙事以帝王的系谱为纲,而又超越了帝王的白日梦,没有蹈入一般历史小说作者难以克服的心理窠臼,也没有以史为鉴影响历史发展的士人自恋。飞翔着歌舞的妙音鸟,可以洞穿历史的奥秘,却不会与历史共谋。向死而生的狂喜中,有对无数毁灭中的新生由衷的祝福。这是一个美丽的神灵,负载着千万年的理想,使命却是侍奉五方佛,自恋却绝不膨胀,绝不僭越,她是精神的守护神。只要不迷失在凶残腐朽的噩梦,祥和的精神总会超越循环历史与宿命人生。

《西夏》以这样多种声音的交响,完成对党项民族辉煌历史诗性的祭祀,也完成对所有苦难人生的精神超度。

【作者简介】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特邀编辑 陈 凯)